

对话余耕

将人物置于极端黑暗的处境激发的究竟是恶还是善？青岛作家余耕在新小说中给出了一种答案——

一场正邪之战最终是与自己的较量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 魏

一段难忘从警经历催生首个警察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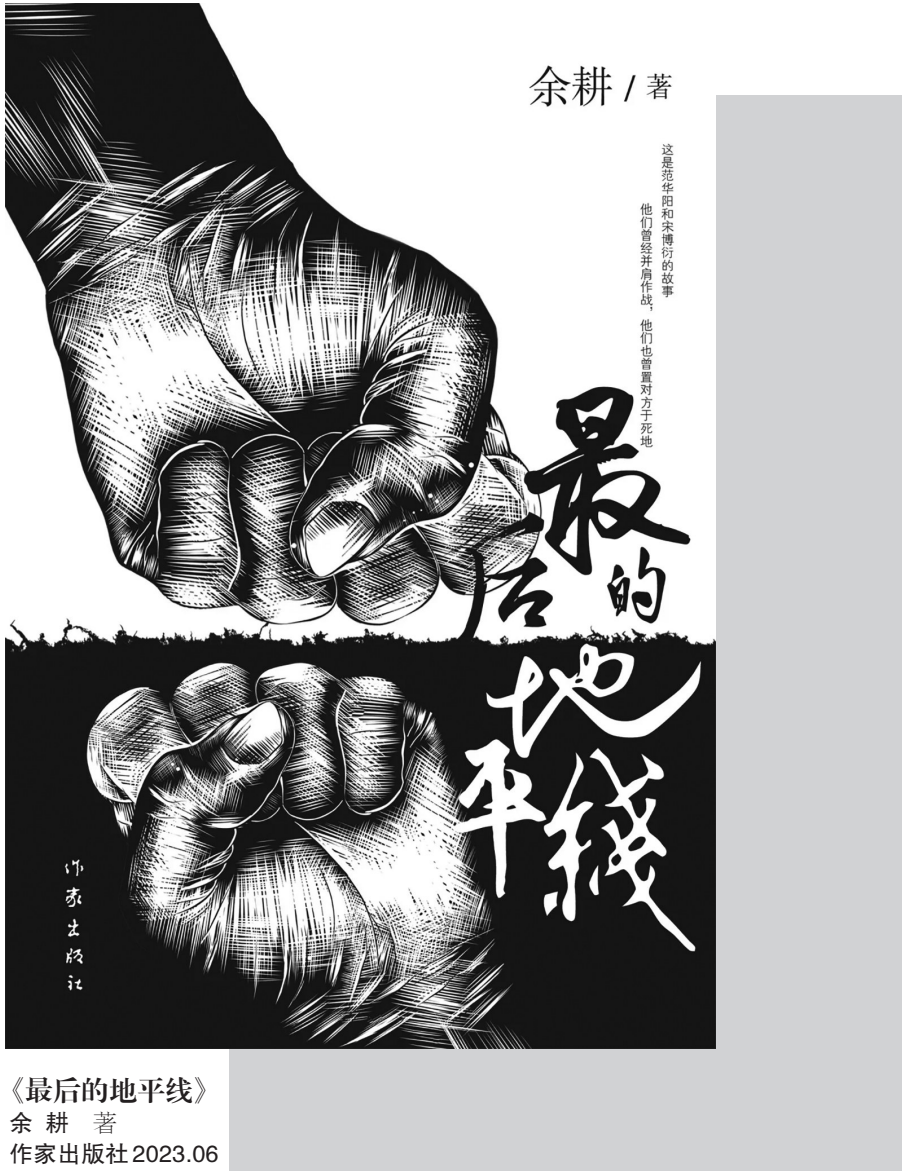
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勒内·基拉尔有一种观点：神话中的众神在早期是善与恶的合体，而后恶逐渐剥离，只剩下善。将人物置于极端黑暗的处境激发的究竟是恶还是善？青岛作家余耕在新小说《最后的地平线》中，给出了一种答案。

这是余耕的第一部以警察为主角的小说。两位男主人公的外表和个性迥异，不过也有相似点：童年世界同样阴云密布，同样天赋异禀，成为刑警中的佼佼者。他们是明里暗里相互较量的好兄弟，彼此惺惺相惜又相爱相杀。在正邪的终极对垒，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阵营，水火不容，而小说的真正动人之处，是善与恶的抉择与蜕变中最终的殊途同归……

因小说《如果没有明天》改编的网剧《我是余欢水》爆火而跻身人气作家之列的余耕，并没有改变自己自由创作的习惯。他始终认为，作家只要提出问题就够了，至于问题的答案以及其中的深意，还要读者自行探问。而他，依然自称只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俗人”。



■余耕，青岛人，不惑之年开始职业写作。都市荒诞喜剧小说《如果没有明天》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网剧《我是余欢水》成为现象级短剧。



《最后的地平线》
余 耕 著
作家出版社 2023.06

青报读书：是否将人物置于极端黑暗和荒诞之中才更利于进行真实人性的解剖和探问？

余耕：读者们总有一个误区，在虚构文学里探寻真实性，又在真实世界里追问因果。极端环境里披露出人性是必然，只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去面对，写作者只好套上一个荒诞外壳，这只能算是一种写作技巧吧。

关于真实人性的追问，不应该由写作者一个人来完成，写作者不可能解决所有关于人性的问题。作为写作者，我觉得提出问题就足够了，由读者和写作者一起去剖析和探问，也许是最圆满的方式。

“地平线”喻指天堂和地狱的分界线

青报读书：关于书名“最后的地平线”，小说中有一处特别点题：是范华阳望见浪潮消失在一线天的地方，发现事实并未像宋博衍以为的那样，“华南没有地平线”，其实范博衍看不见的地平线，竟然一直就在他身边。“最后的地平线”，其中有着怎样的隐喻？

余耕：地平线是这部小说的书名也是意象，当过刑警的人都知道一句话：刑警一脚在监狱外，一脚在监狱里。而作为警察这个特殊的职业，

他们应该是地球上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转念之间也是一步天堂一步地狱，而地平线则是天堂和地狱的分界线。

青报读书：提到隐喻，小说里有两处。一处是写普洱茶，发霉发酵的坏茶喝下去后，竟然诞生出一个全新的派别，由好至坏，再涅槃升华成了美味；另一处写一根香樟木料，香樟木的浮力大，浸水后也不会沉底，反而发散韧性，碰到石头也不会散架撞烂……看似写物，实则都是在写人，可以这样理解吗？这是不是正是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

余耕：这样解读没有问题，因为人性是复杂的，很难用简单的好与坏划分。作为警察，恐怕时时都会在欲望和底线之间纠结，有人会在欲望里堕落，也有人会在触碰到底线时反弹。如果说范华阳是那根香樟木，那你把宋博衍想象成普洱茶好了。

尝试在剧本和小说之间找到平衡点

青报读书：你曾经评价作家莫言是一个讲故

事讲得很“高级”的作家。此处“高级”作何理解？什么样的故事才可称之为“高级”？

余耕：莫言那一代中国作家受西方文学影响较深，他们的作品里面有很浓厚的西方文学叙事痕迹。我认为莫言老师的“高级”是博采东西所长讲述中国故事，而他并不偏不倚恰好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语言风格的平衡点。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接受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讲述便可称得上“高级”。

青报读书：这个问题尖锐一点。有读者指出你小说的弊病：一味强调故事情节的讲述推进，而缺失了相对细致深入的人物刻画。也就是说，更多是通俗文学而非纯文学的范畴。你是如何定位自己的文学写作的？

余耕：我没有给自己的作品做任何定位，我也不介意自己写的是纯文学或是通俗文学。我觉得小说首先不应该背离最初的基本功能，那就是讲好一个故事。大概是我做编剧出身的缘故，我总是尝试着在剧本和文学小说中找到一个平衡，让小说剥离冗长的景物和内心描写，加强情节推进，同时也让剧本具备大众能够接受的文学性。

青报读书：有女性主义者发声，感觉作为女性，她们在《我是夏始之》这篇小说中被冒犯到了，无法认同女主人公的处境。

余耕：《我是夏始之》这篇小说的确有很多来自女性批评的声音，我倒是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可能是“夏始之”恰好戳中了一些女性的痛点。女性意识觉醒说明社会在进步，但是现实生活中女性被剥削是大量存在的，任何一种方式的存在都有记叙和探讨的价值，哪怕作为一种反向启发能够让女性思考和批评，我觉得这都是《我是夏始之》的价值。

“拒绝命题，拒绝压力”是我创作的底线

青报读书：书写小人物困境与心态的小说《如果没有明天》，因改编成网剧《我是余欢水》而爆火，是否也给之后的写作带来了压力，抑或是创作方向上的变化？

余耕：关于写作，我不存在任何压力。写作让我感受到最多的就是自由，这也是我能长久坚持写作的原因。拒绝命题、拒绝压力，是我创作的底线。我也不会刻意追求创作方向的变化。

刚刚过去的一年正在带领团队写一个电视剧剧本，也是大都市里小人物的故事。作为一个小人物，我对小人物的心理把控还是游刃有余，这让我在创作的时候能够得心应手，也会使得我笔下的小人物更接地气。

青报读书：据说反许小说《做局人》续篇的写作已经提上了日程，为什么会对这一题材情有独钟？

余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上当受骗，也就是说社会上的骗子有很多，而且行骗方式花样翻新，稍不留神就会落入骗子的圈套。此前，我已经罗列了几个《做局人》续篇的骗局，其中包括AI语音模仿和AI形象模仿行骗。但是，Chat-GPT的推出使得AI语音和形象模仿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而且也被骗子们几乎同步利用。所以，我只好放弃这个骗局的设计。这一点，说明AI技术和骗子们都在高效地学习和研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对这种技术加智力的博奕的确有兴趣，也尝试看看能否走在骗子们的前面，给读者们多一点警示吧。

“漂泊感”也许正是我创作的“天赋”

青报读书：记得你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在家乡青岛说着自以为地道的崂山话，却依然被认定为“外乡人”。这种没有归属感的漂泊者心态，会对作家的写作产生影响吗？

余耕：这几年回到青岛才听说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青岛的鄙视链。据说在八九十年代，市南区的区人绝少会找沧口或李村的对象，更别提我们沙子口了。而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青岛，全国各地都有，甚至包括我们原以为是段子的“伦敦腔”，都是真实存在的。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任何一个区域都会存在鄙视链现象呢？这个现象好像无关乎格局和心智，但我还没有想明白。所以，我觉得没有归属感也挺好，可以让一个写作者始终持有一个客观视角。由此看来，我从小就有的“漂泊感”或许正是我创作的“天赋”。

疾病、死亡、衰老这些讳莫如深的主题，在周芳延续的非虚构写作中焕发着生命的热望与人性的尊严——

写作是还给生活应有的“看见”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 魏

●死亡封了他们的口，我给沉默者以尊严

●创作自由度，更取决于对文学真实性的忠诚

●写出人的不易与珍贵，是文学的情义和力量



■周芳，著有非虚构《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及散文集《沽酒与何人》等作品。历获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奖项。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青年作家周芳以苏轼的诗句为题，完成了她的第三部非虚构《我亦是行人》。在《重症监护室》和《在精神病院》之后，她的写作依然延续着疾病、死亡与衰老的主题。

日前，长江文艺出版社进行的线上采访中，周芳如是解读书名的含义：“当我在书写一个猝死在麻将场老人的疾病，衰老，死亡，也是在书写我的病，我的老，我必然要到来的死。在书中的人物身上，有无数个‘我’。他们活过的岁月，都是我们活过的，或是终将活过的。你我皆行人，相扶相携走在人间路上，值得。”

《我亦是行人》收录了九个人的死亡与生命故事，他们彼此勾连，或有着血缘上的亲缘，或是生活中密切联系的人，如：大舅李中焕，小学数学老师夏明圣，同学夏梅梅……他们整体构成一个熟人社会：地理空间上，往复出现在周芳笔下的“林下村”；命运走向中，又彼此交集，或相亲相爱，或相生相克……书中的九个人，死与生各具特质，每个人物都裹挟着各自独特的生之气息——

《血色王传奇》中的王爹爹，混迹于麻将馆，花言巧语撩逗婆婆们，而“色”之下，却是对青梅竹马的欧阳婆婆几十年的痴守至死；“迂腐老师”夏明圣，被漂亮女同学来探看后，叫老婆拿捏住，受尽欺负，挨枕头砸，挨大舅哥说教。他死在去更改一道题目的路上，老婆抱住他，哭得死去活来……

周芳说，《我亦是行人》与其说是探究“死”，不如说是探究“生”。是在那些重重叠叠的往事中，还原生活本来的面貌，它有声有色，有戏剧化

的命运，有烟火气，有人情味。

青报读书：死亡的命题，国人一直都是讳莫如深。九个人的死亡，九段人生，你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遴选素材的？

周芳：这九个人的标准便是：他们用心地活过，他们对生活有过热望，有过情义。他们或许终其一生庸庸无为，沉默如草芥，不能用所谓的“成功学”来界定他们，他们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可是，他们也有着自己生命的故事，卑微中有高贵，孤寒中有热烈。死亡封了他们的口，我写下他们，给沉默者以尊严。

青报读书：书中有大量丰富的生活细节，包括琐碎的家长里短、流言蜚语，你是如何挖掘这些细节的？

周芳：这些细节一部分来源于我自身积淀的原生经验，如家庭记忆，乡镇农居传承的世俗经验，医院的医护经验，也有一部分是对隐匿在城市意象背后的隐秘经验的探索，如对麻将馆等场景及各色人物对话的体察。麻将馆是个特殊之处，它本身是各种信息的传播之地，滚动着社会各种动态的舆情讯息，每天到这里来的婆婆婆婆，“嚼嚼婆”、“乌龟刘”、“满月嫂”……人人都有大篇的人生故事，上演的都是流动的人间大戏。

青报读书：从《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再到《我亦是行人》，一直都在写非虚构，为什么没有选择小说的体裁来创作呢，虚构文学难道不是意味着更大的创作自由度吗？

周芳：所谓“创作自由度”，在我看来，它不只关乎体裁的限定与选择，而更重要的是对文学真

实性的忠诚。凭借这份真诚，最大限度地呈现作家对世界的理解，自我、生命、时代的真相，以及每个个体的困境和他们生活价值的追问。

小说强大的想象虚构空间，能抵达真实与自由的彼岸；非虚构，则以鱼潜于水，扎根于土的姿态牢牢站定在生活热土上，同样能深度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我以为，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中也闪烁着想象力的光芒——我们想要抵达何种真实，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层面的真实，离不开作家的想象力。

我认为，非虚构同样是敞开心式写作，在向现实的无限打开中，个人经验与现实的遇合同样爆发出最大的表现力量，获得最大的创作自由度。

青报读书：你曾经说过，面对生死，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写作而写作，会感到羞耻。那么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周芳：在写《重症监护室》和《在精神病院》之初，我曾进到重症室和精神病院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以为我是在体验，在暗访。实际上，每天面对那些生生死死，那些命运中的哀苦与挣扎，写作显得如此轻微。对于我来说，写作是还给生活应有的“看见”，生命应有的尊重。那些遮蔽的，要得到呈现。那些流逝的，要得到永驻。写出人之为人的不易与执拗。

我的文学世界里会有苦痛，会有阴云，但些微的欢喜必然的青天一定隐身其后，伤疤要长出鲜肉，废墟要开出鲜花，漫漫长夜要有黎明的脚步，这就是成为一个人的不易与珍贵，这也是文学的情义和力量。



《我亦是行人》
周 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3.05